

五道营走出金受申

杨良志

安定门里,路东,第一条胡同叫“五道营”。这是旧京城东北方向上很重要的一条胡同;它南临国子监和孔庙,与声名赫赫的成贤街由一条慈悲胡同相连通;它的东口外,一抬头就是满目辉煌的雍和宫。

在北京一中学习的时期

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,金受申诞生在五道营胡同路北36号(今99号)的宅子里。

十多年前夏一日,我曾寻访金家旧宅,石阶、砖墙率然旧物,老门板上的新对联十分醒目。当年父子留影的北房大体依然,窗前的几杆翠竹难得的葱茏滴翠。

金受申是满族人,原名文佩,后改为文霏,字泽生。他通常所用的“受申”,是算命先生白云趾取的。

金受申少时,在北新桥东南方向上的“老君堂小学”——后改为“东四十二条小学”读书。这大略是1910年代的事情。1910年代末,1920年代前期,他在“市立第一中学”——即后来的“北京一中”上学。他的小学和中学,都在离“五道营”不远的地方。我们可以想象:“老金家”那个叫“文佩(或文霏)的实诚孩子,着半旧长袍,挟粗布书包,沿着一条条古老的胡同行于在上下学路上的情景……

北京一中是一座值得关注的学校。它的前身,是建于清代末期的1898年的“经正书院”——这原本是属清贵族“八旗”的官学系统的。辛亥革命成功,中华民国建立,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。1912年,“经正书院”被改组为“京师公立第一中学”,学制、课程和管理都做了根本性的调整。一中的学生,参加了“五

四运动”的游行和罢课,时代大潮的洗礼,使这所古老的学校新风激荡!而这几年,金受申正在一中读书。

当时也,在北京一中,正会聚着在北京近代教育改革史上卓有贡献的三位人物——董鲁安(于力)(1897—1953年),舒庆春(老舍)(1899—1966年),罗常培(罗莘田)(1899—1958年)这三位人物,后来走过各自的人生道路,分获“革命老人”、“人民艺术家”、“语言大师”的称号。而在当年,他们风华正茂,逸兴遄飞,在北京的教坛上,在学生的心目中,如同是一颗颗彗星——尽管是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,却留下了惊人的美丽,永恒的光芒!他们共同的学生金受申,勤读苦学,才具超群,而又拙朴醇厚,锋芒内敛,这自然会得到他们的青睐。再加上,辛亥革命以后,满族人受到了贬抑,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,这位颇有些“早慧”——甚至是“早熟”的“金”家后生,顺理成章地会被恩师格外督导和关照。

一中时期是他生涯中的重要几年,最根本的,是养就了他那种读书向学、孜孜不倦的可贵精神!金受申先生留下的《仄韵楼日记(第一册)》,通览之后我们尤其突出地看到:从一中毕业了的金受申,拼命地读书以积累知识。在那一年酷热的旧历七月之中,他隔几日便买书,一月间买书竟达百十本之多!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:他买书的所有花费,一体出自于他给《益世报》《小小日报》等撰写诗文所获的稿酬!

文联大院里的金受申

1938年10月1日,在北

京,《立言画刊》创办。这是一份十六开本,每本40页,每星期出一期的周刊。三十三岁的金受申成为这份刊物的主要撰稿人。他执笔的一个重要栏目,叫《北京通》。从创刊的1938年,到终刊的1945年,七年时间中《立言画刊》出了三百五六十期,金受申也就写了三百多篇说北京的文章,而他的年龄,也由三十三岁进到了四十岁。“北京通”三字,从栏目名不知不觉地转为对金受申的一种称誉。

1950年5月,老舍担任了北京市文联主席。正是用人之际,他不能不想到过去所熟知的金受申。邓友梅《印象中的金受申》一文中写道:

金受申是老舍先生使了些劲才调到文联来的……老舍先生对他的关怀给我留下了挺深刻印象。为调他来文联,老舍先生说了好几回:“这个人有用,现在他处境困难,咱们调来也算是人尽其才。大伙都帮帮忙,都是动笔杆的……”

金受申来了,先在《说说唱唱》,后在《北京文艺》,当编辑。编辑部就设在北京饭店后身霞公府15号市文联的大院里。邓友梅曾生动地回忆过这大门口的情景:进进出出的经常是一伙子大名人——李伯钊、赵树理、马烽这些从解放区来的,抑或是老舍、梅兰芳这些在“国统区”或从国外回归的……一位瘦溜溜的中年人忙不迭地向门房打揖,原来他是马连良;一位俏娘子在门外伸长脖子巴望,原来她是新凤霞……如今已然消逝这个大院,曾经是如此群星闪烁,动人心魄!

在编刊,“为他人做嫁衣裳”之余,几十年摇惯了笔杆子的人,自然手痒。金受申抓住了“北京的传说”这一“题眼儿”,渐蓄



今天的五道营胡同

渐积,1957年,1959年,次第出了《北京的传说》和《北京的传说(第二辑)》两本小册子。这时节,他已地地道道是“年过半百”的人了。作为“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”,他努力地跟上时代,做好自己的工作,同时仍旧笔耕不辍。

那些人我们不该忘记

1966年夏,“文革”爆起;8月23日,老舍、萧军等一干人在国子监惨遭毒打;8月24日,老舍在京城西北角的太平湖投水自尽……

这一切带给金受申的刺激

无疑是致命的。他惊惧不已,身罹重症,距此不过一年半,1968年1月,他离开了这个世界,享年六十二岁。

时光如水,距离我上次踏访五道营胡同,一晃间十多年过去了。如今的五道营,已然是我们东城正在开发的前景无量的旅游、商业新景点。胡同中暂新的特色店铺相连,空气中弥漫着烹焖海鲜、热煮咖啡、插花绿植以至名牌香水的各色气味……金受申先生的老宅已无处寻——但他的后人说原来院中的一棵枣树犹在。

五道营啊,从我们的五道营曾经走出了金受申。这个胡同会记住他,我们更不应该忘记他。

闲说剃头这点事

韩春鸣

理发者,也很难见到“一头热”的剃头挑子。不过,大年三十之前,发廊或是美发厅总是人满为患,不知是否因为担心“舅舅”命运的那一句老话。

在大清年间,头发剃与不剃可是人命关天。民国初期有一本《旗族旧俗志》,明确记载:至清之世,则令世人将发辮放落,四围剃去,留存辮顶之一部分,名之曰“剃四外,留中原”,违令者斩首,谓之“留发不留头”。

“一头热”的剃头挑子由此兴起。理发匠不是一般平民,而是穿官衣,吃皇粮,拿俸禄的差事。那时节,剃头不剃头不是个人私事,关系你对清王朝的态度,剃头匠的重要职责之一,就是通过剃与不剃,看你是顺民还是“刁民”。

清初时期剃头匠有的设摊,有的则是用扁担挑着一个挑子沿街转悠。扁担一头是个长方凳,凳子下面安装有三个抽屉,分别放置剃头所有器具:围巾和

剃头刮脸用品等;另一头则是一个长圆笼,里面放置一个小火炉,炉子上面放置一个铜脸盆,以保持洗头水的温度。

剃头挑子前后两部分均漆成红色,以示尊异。剃头挑子上还插有一小旗杆,上悬挂有龙旗,牛皮制的鬃刀布据说有尊崇皇帝圣旨之意。

剃头师傅手持一种“唤头”作为市声。所谓“唤头”是一条状似镊子的扁铁,长约30公分,剃头匠用一细铁棍,从扁铁中穿过,发出“嗡嗡”声。人们听到这独特声响,便知道剃头匠来了。

剃头业的祖师爷,传说是白云观的罗道士。当年雍正皇帝理发极为讲究,要求什么“松辮”、“紧辮”、“锅圈儿”等等梳理修饰方式,颇费功力。有一天,雍正正在让太监为他梳辮子时感觉头部很痛。雍正生性多疑,认定这剃头的小崽子心怀不轨,一怒之下,接连砍了几个剃头太监的脑袋。其实不是太监们不小心,而

是雍正皇帝脑袋顶上长了疮,那剃头刀一挨疮口,还能不流脓淌血?这件事让白云观一位姓罗的道士知道了。罗道士祖籍湖南,平时好钻研,给别人剃头理发时,琢磨出了捏、拿、捶、按等按摩术,还制造出特别顺手的剃头刀、刮脸刀、取耳、清眼等用具,他还发明了梳辮子用的刷子、挽子、篦子以及耳挖勺等器械。罗道士很同情遭遇不测的小太监,便将自己发明的剃头用具以及“打眼”、掏耳朵、“放睡”等按摩术传授给宫里太监。所谓“打眼”,就是眼部按摩。剃头匠手持一根四寸长、顶端呈珠子状的过头针,令珠状物在眼皮上轻轻滚动;一根金属制的耳挖勺和一根耳绒,在耳朵里轻轻掏捻,会给人带来阵阵快感;而“放睡”,则是用双手对头顶至腰部穴位逐一进行捏、掐、捶、擦、揉等方式的按摩。要求剃头匠用劲要均匀,节奏明快。

从此以后,雍正皇帝理发时

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享受,他的头疮很快痊愈了。皇帝对罗道士这一套理发用具赐名为“伴朝銮驾小执事”。后来罗道士辞世,葬在白云观里,即现在的罗公塔。雍正皇帝特别给罗道士一个封号:“恬淡守一真人”。此后,理发业便称罗道士为“罗祖”。早年理发店供奉的祖师爷,便是这位罗道士。

早先的剃头匠出道必须懂得“三不剃”、“三不鸣”规矩。清初,有三种人不在剃发令内,称“三不剃”,即妇女、僧道和乞丐。“三不鸣”,指在使用唤头时过庙不鸣,怕惊了庙里的鬼神;过桥不鸣,怕惊了四海龙王;过剃头棚不鸣,怕搅了同行生意,即“行对行不响唤头”。

剃头匠学徒首先要背《净发须知》,据说这是剃头匠祖传道范。学到的手艺视作“师传衣钵”,假若只会耍手艺不知《净发须知》,会被同行讥讽为“有师无祖”,遭到同行排挤。